



广西民族专家学者论坛专稿选登之七

我从事民族研究的经历及体会

□ 翁乾麟

简介

翁乾麟,1951年12月出生,广西临桂县人。回族。1969年2月下乡插队。1976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。1976年11月赴西藏工作。历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干事、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。

1986年1月调回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。历任广西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、《广西民族研究》副主编、助理研究员。在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,发表有《红水河地区壮族人口的变迁》、《广西布努瑶的经济生活:兼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》、《东兰县武篆镇壮族调查》、《东兰县长江乡壮族经济与社会调查》等论文。1992年6月,调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,历任广西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。2002年,任广西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,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学科带头人。有15项研究成果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,其中二等奖5项,三等奖10项。2004年,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誉。



翁乾麟

1986年1月底,我从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调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。从此开始了从事民族研究的学术生涯,迄今已27年。27年间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一是1986年至1992年,当时在民族研究所工作,主要从事民族经济与回族的民族研究,同时参与《广西民族研究》的编辑;二是1992年至今,在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。主要从事农村经济、民族经济的研究,同时也坚持从事回族的民族研究。无论是在广西民研所工作,还是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,我对民族研究都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。前几年,广西社科联帮助广西100名学者出文集,我有幸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帮我结集出版的《翁乾麟集》,有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关于民族研究的,也说明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广西的民族研究。这篇文章,我想结合我在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经历,对广西民族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谈点个人的理解。

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,广西各级政府与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研究,据我所掌握的资料,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,广西区政府即根据国家民族识别工作的要求,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研工作,经整理,出版了大量的民族调查资料。改革开放以后,广西又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,民族区域自治、民族历史与文化等问题上的研究上开展了大量的工作,为广西成为民族工作“四个模范”作出了贡献。总结历史经验和个人的体会,我认为,要做好广西的民族研究工作,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重视学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。

学术资料和学术研究的关系,我理解,就是粮食与军队的关系。没有学术资料作基础的研究,一定是空洞的,没有实质内容的研究。因此,要做好学术研究,必须高度重视学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,这是开展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条件。

1986年我刚到广西民研所工作时,给我印象最深的,便是民研所文献资料的丰富。举例来说,1986年,民研所要编《广西通志民族志》,因为我是所里唯一的回族学者,所以,“回族篇”便指定由我负责(顺便说一下,在这之后,广西回族史的研究也成了我的重要研究

方向)。由于广西回族人较少,并且主要集中在桂林一带,所以,回族的资料极少,这给我完成这一任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当时,李干芬先生(原任民族史研究室主任,主要从事壮族史研究)告诉我,民研所资料室收藏有一套五十年代的回族调查资料,让我去找一下,我找到负责资料室工作的谭月仙女士,在她的帮助下,真的找到了这份资料,是一份手写稿,当时我感到十分的高兴。以后,以此为基础,我又到柳州、桂林、临桂、永福、灵川、鹿寨等地进行调查,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。由于资料工作做得比较扎实,文稿很顺利地通过了评审。作为副产品,我还编出了《广西回族和伊斯兰教史料汇编》,约10多万字,以后由广西民族学院民研所打印了50本,分送许多学术机构,成为广西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。这只是一个例子,说明民研所重视资料的收集及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。在此之前,唐兆明先生编写有《灵渠文献粹编》(中华书局),李干芬、黄钰等先生编有《广西壮族调查资料》《广西瑶族调查资料》《广西仫佬族调查资料》《广西京族调查资料》《广西少数民族碑文资料汇编》等,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,是广西民族研究宝贵的财富。除此之外,民研所在出版所刊《广西民族研究》的同时,还出版《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》(内部)。据我当时的印象,两个刊物中,一般读者似乎更愿意自己花钱买《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》(内部),因为有大量资料,学者们写文章更需要的是资料,而不是别人的论点。民研所当时每年还出一本《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》论文集,每位学者提供两篇文章,也很受学术界的欢迎。

第二,重视基础研究,也不放弃应用研究。

一个研究所要得到学术界的承认,必须有成果做基础,正如一个学者要得到学界的承认必须有成果做基础一样。科学研究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类,这在学术界是众所周知的。但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,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。一般来说,基础研究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的研究,在短期内,是不以效用为目的的。应用研究则有很强的功利性,它的意义取决于对现实生活是否有

用,没有用的,即认为没有意义。这两种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。好的基础研究,也可以产生重要的应用价值,如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,常常是从基础研究的突破开始的。而好的应用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,也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好的课题。

广西民研所历来以重视基础研究出名。举例来说,白耀天先生的壮史研究、潘世雄先生的铜鼓研究、黄钰先生的瑶族过山榜研究、覃圣敏先生的花山崖壁画研究、壮傣文化比较研究,以及后来民研所部分学者协助张声震先生主编的《壮族通史》,都是十分重要的成果。历史上,民研所之所以在广西学术界有影响与声望,之所以成为广西民族研究的重镇,就是因为民研所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。值得指出的是,广西民族研究所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,并不小视应用研究。比如,我在民研所期间,主要和俸代瑜、贾晔、陈家柳等从事民族经济研究,我们曾经坚持数年,每年3月木棉花盛开时都到红水河流域进行调查。当时我们都还年轻,没有太多的功利,看着红水河两岸盛开的、通红的木棉花,我们感到心旷神怡,一点也不觉得累。当时,我们从事的红水河流域经济与民族调查,即得到民研所领导韩肇明先生、白耀天先生的大力支持。我们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,如《红水河流域壮族人口的变迁》《广西布努瑶经济生活管窥:兼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》《红水河流域的土地问题研究》等,也都得到学术界的好评,其中《广西布努瑶经济生活管窥:兼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》被广西民族大学作为经济人类学硕士生参考文献。后来,这些文章结集送广西社会科学联合会评奖,曾获得二等奖。近年来,广西民族研究所根据现实的需要,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,如民族法学、生态人类学的研究,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与民研所不同,社科院既重视基础研究,又重视应用研究,重视当好政府的智囊团,取得了突出的成绩。比如,许多年来,社科院做了大量的课题,许多都是与政府关心的问题相联系的,如东南亚研究、农村经济研究、社会热点问题研究等,反映是很好的。学术界有的人不太看得起应用研究,认为是大路货,是不对

的,因为真正的、高水平的应用研究价值即很高,也是很不容易的。比如,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做的许多研究,就为美国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,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。所以,无论是民族研究,还是经济研究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做应用研究,而在于从事研究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,没有独立性的研究往往没有生命力。所以,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,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。

第三,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,不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。

经验证明,学术研究要取得高水平的成果,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,不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。这是因为,学术研究是一种十分辛苦的工作,通常以学者个人劳动的形式进行,如果不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,过多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,就很难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创新精神,就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质量,从事学术研究就很难调动学者的兴趣与积极性,而兴趣有时是很重要的。这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规律。遗憾的是,现实生活中,少数人有时不是很理解这一点,总是想用行政方法去管理学术研究,往往效果不好,这是值得总结的教训。广西民族研究所和社科院在这方面可以说都是做得比较好的。表现在,个人研究方向的选择上,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和自由。比如,在主流的壮族史、瑶族史研究之外,民研所也允许一些人研究少数民族的丧葬问题、少数民族文学、民族区域自治法问题等。在社科院,许多也是既根据社会的需要,又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选择研究方向,事实证明,这是正确的。所以,要做好学术研究,一定既要注意社会的需要,又要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,不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,科学研究这个规律一定要遵守。

第四,新老学者相互提携,相互帮助。

在学术研究中,新老学者相互提携,相互帮助也是十分重要的。在这方面,学术界有许多佳话,成为学术界人皆乐道的趣事。例如一些新老学者合作出版著作等。我在民研所工作期间,有几个人对我的影响比较大。一是老所长张景宁先生。他当时并不经常到民研所,在我的印象中,大约只来过两次,因为他当时还是自治区人大副主任,民研所所长更多的只是一种荣誉职务。但是,他十分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。有一次,他到民研所给我们讲话,希望我们一定要重视学习外语。他去世前,我陪所的领导去他的住处(当时在江南区靠近西园饭店附近的地方),见他家时并无太多的家具,但书很多,许多书没有地方放,就放在了地上,有大本头的日文词典,后来又知道他是留学日本的学者,对他又增加了一份敬意。当时,我刚调回广西不久,只写了几篇不太像样的文章,但所领导在向他介绍我时,他说看过我的文章,让我既感到受宠若惊,又受到

了激励。所以,我的成长,和老所长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。二是白耀天先生。我调回来时,组织上分配我和白耀天先生、小邵一起编辑《广西民族研究》,我们3人朝夕相处,关系非常好。白耀天先生,广西上林人,壮族,是十分有才华的学者,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。早在上大学期间,白耀天先生的论文即已由日本学者翻译介绍到国外。在到民研所工作之前,主要在上林县当中学老师。到民研所以后,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,比如《墟考》《依智高:历史的幸运儿与弃儿》《历史上岭南诸神考源》等,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。白耀天先生有才华还表现在他讲话有文采。比如,有一次,我们在民委办公大楼与泰国学者交流,轮到白先生讲话,他的讲话十分精彩,当时已到吃饭时间,但泰国学者说,一定要听完白老师讲话才吃饭,他的讲话十分精彩是主要原因。在民研所期间,我诚心诚意以白先生为老师,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。比如,他和我谈,写文章要注意3点:一是写文章要重视资料性。写文章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,至少要有资料,让文章有保存资料的价值。比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到现在还有很多重要的价值,因为资料宝贵;二是写文章要尽可能有自己的观点。他说,“做人要求同存异,写文章要求存同存异。做人不求同存异,就谁也合不来”,这真是至理名言。因为写文章如果不能求同存异,大家都说一样的话,这样的文章就谁也不愿意看;三是写文章要尽可能少写时论,因为时论文章很容易过时。多年来,我一直非常尊重他讲的这些话,并将这些话作为自己做学问的“座右铭”。三是潘文先生。因为我刚回来是主要研究民族经济,所以,我和研究经济问题的潘文先生接触比较多。客观地说,潘文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多,但是很认真,特别是重视维护一般民众的利益,这点让我对他十分尊重。比如,他曾经写过西津电站的文章,维护库区移民的利益,他的文章引起政府的重视,使库区移民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,库区移民对他十分感谢。我和他一起去广西凭祥、龙州等地调查,曾撰写过《广西边境贸易调查》的文章,后来发表在《广西商业研究》上,是80年代较早研究广西边境贸易的文章。我在社科院工作期间,也有一大批学者学问根深蒂固,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比如邱振声、何昇煌、詹宏松、黄铮、李甫春、周中坚、宋德生等,我通过与他们接触,或拜读他们的著作,也学到很多东西,我终生感谢他们。其中我与周中坚先生的交往更多一些,周先生也是上林人,壮族,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。周中坚先生治学态度十分严谨,乐于助人。我的文集编出初稿后,曾请他指正。我在担任广西社科院农村发展所所长期间,曾邀请他和其他一些学者给本所的年轻学者讲授治学的经验,也受到大家的欢迎。